

哲學論壇

中國民族文化與神學交匯的焦點課題

——中華神學初探

■ 梁燕城

本刊總編輯

摘要：基督教傳入中國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目前，中國文化的價值全面復興，而社會也產生很多新問題，在這全新的處境下，中國基督教須尋索其在二十一世紀中國民族文化中的新定位。本文專門討論了「中華神學」在當前應有的方向，認為中國基督新教發展至今天，當是進行深入神學反思的年代，若要生根中國，必須以中國思維方法，以中國處境來消化及架構聖經真理。若成功建立生根於中國的「中華神學」，將是人類文明的一大成就，也是基督教成功融合西方文化後最重大的發展。

關鍵詞：基督教，中華神學，神學反思。

中國基督教與新時代神學反省

景教碑記載第一位基督教宣教士來華，「大秦國有上德。曰阿羅本。占青雲而載真經。望風律以馳艱險。貞觀九祀至於長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齡總仗西郊賓迎入內。翻經書殿。問道禁闈。深知正真。特令傳授。」時為公元六三五年。從景教來華算起，基督教傳入中國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然而經過唐代和清初兩次政府的全面消滅，直到基督新教馬禮遜一八〇七年來華，二十多年只帶了十人受洗，至一八四二年之後才正式大規模傳入，至今有二百年的歷史，其間多次受到政府與文化的排斥，但到二十一世紀已有數千萬至一億信徒了。

在西方歷史裏，基督教興起也受到羅馬帝國的多次迫害，也被希臘羅馬的主流文化排斥。自基督復活後，無數信徒經流血犧牲，把福音深入人群之中，到第一世紀末，使徒時代之後，就進入了神學反省活躍的「教父時代」。這個時代是基督教融入希臘羅馬文化的偉大過程，並因此使基督教生根於西方文化，不但不被排斥，且已成為西方文化不可分的精神資源和價值元素。

中國基督教也反省到融入中國文化問題。早在十九世紀後期，已有一些具學養的中國基督徒反省中國文化與信仰的融合問題，散見於當時的《教會新報》與《萬國公報》，如張更生、劉常惺、鄭雨人等[注一]。他們發表的文章雖未算正規神學著作，但也初步觸及神學問題，是中華神學的最早反省。經過二十世紀頭五十年種種國難和內戰，中國基督教開始有更多神學反省，如趙紫宸、賈玉銘、徐寶謙、張亦鏡等人都作出努力[注二]。

二十世紀後五十年，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九年在大陸的神學研究空間收窄，中華神學反省多在海外，有更多系統性的理論嘗試。在中國改革開放後，大陸教會也大大發展，產生了一批基督徒知識份子，開始作出神學反省。如今中國基督教已有根基，全球華人信徒最低估計超過三千萬，最高估計有一億多。中國本身經濟與社會高速發展，GDP成為全球第二，中國文化的價值全面復興，社會產生很多新問題，中華民族仍在艱苦前進。在這全新的處境

中國本身經濟與社會高速發展，中國文化的價值全面復興，社會產生很多新問題，中華民族仍在艱苦前進。在這全新的處境下，中國基督教須尋索其在二十一世紀中國民族文化中的新定位。

一個用中國心靈消化的基督教神學，既從基督教文化傳統充分了解西方精神優秀之處，又完全體會中國境界的深度，可以成為橋樑，溝通中西，帶來兩大文明的彼此參照。

下，中國基督教須尋索其在二十一世紀中國民族文化中的新定位，包括以下三個反思的大方向：

一、如何在新世紀尊重、承擔、檢討和更新中國文化

今日中國文化傳統價值在中國本土正在復興、重整與更新當中，要融會和吸收馬克思主義、西方傳統價值、後現代文化及基督教精神等，企求吸收世界文化的優秀價值，以建立後後現代的中國文化。

基督教在此須深入而正確地了解傳統中國文化的價值，包括哲學、文學、藝術、歷史等，通過深度的體會、欣賞、肯定、檢討、並加以超越的反省，使中國文化成為神學思想的資源，尋索信仰生根中國之道，回答中國人所涉及的獨特神學問題，並在堅持聖經核心真理的同時，以中國思維的方式去消化信仰的基要真道，以中國的方法和課題重新架構，建立適切於中國人心靈的神學框架。此中既要參照西方神學，更要擺脫西方神學的希臘、羅馬及啟蒙運動的思想方法和框架。

一個用中國心靈消化的基督教神學，既從基督教文化傳統充分了解西方精神優秀之處，又完全體會中國境界的深度，可以成為橋樑，溝通中西，帶來兩大文明的彼此參照。同時也投入中國文化的重建與更新，建造一個深度的新中國文化，其中能融合基督那公平正義、超越反省及無條件愛眾生的精神。

二、如何承擔民族的命運

中國人在近現代歷史中經歷深重的「文化創傷」[注三]，因著百多年的苦難，故民族在回應現實挑戰時常有不合常理的反應，如義和團之亂、軍閥內戰、大躍進、文化大革命、改革後的商業騙局、官員貪腐等。中國基督徒須像基督道成肉身進入人間一樣，以恆久的忍耐、寬諒和愛心，去醫治民族的內在創傷，協助中華民族重建信心、盼望與愛心。

中國基督徒應深入而全面地了解中國

近現代歷史，對中華民族的苦難有體會，對其發展的命運有承擔，面對當前歷史的新契機，進行神學反思，探討信仰與現實歷史的關係，特別是天國的神學意義，如何落實為以仁愛美善去貢獻中華民族之道。中國基督徒不但要傳福音，也須以天國公民身份，成為有道德的現世公民，投身於當前這歷史，與中國人同行，了解和分擔民間的疾苦，提供各種改進的建議給政府，協助改革走得更为穩定和完善。

三、如何與當前中國社會相適應，關愛每一個人

因中國急速發展時，產生社會上很多難題，中國財富大大增加，但貧富差距也擴大，貧富懸殊隱含衝突的危機。中國社會的處境，一方面是農村與城市民工形成龐大的弱勢階層，貧困與不平帶來很多苦痛，另一是世俗化社會形成貪婪與自私的文化，富裕與中產階層心靈空虛，社會權貴在道德上鮮廉寡恥，這都形成發展中的危機。

中國基督教須在嚴峻的社會現實中作「道成肉身」的神學反省，以行動去實踐基督那無條件的愛，去關懷扶持貧困弱勢者，以崇高的品格去建造社會的道德，對當前中國社會的精神和物質需要提供支援。

這三大方向，在過去宣教士都有過努力，第一個是利瑪竇的模式：尊重文化；第二個是李提摩太的模式：承擔和改革民族困境；第三是戴德生的模式：與困苦者同行，見一個中國人，愛一個中國人[注四]。今日須綜合這三大模式，以基督徒的投入，去達至中華文化的更新。

這也是我與一團隊有愛心的人在一九九四年成立「文化更新研究中心」之動力，「文更」奮鬥十九年，理想是盼望基督教能與中國文化和好，也能全面貢獻當代中國的發展，以愛的行動醫治歷史創傷，以尊重和對話來更新中華文化。十多年來投身參與中國的發展，出版了七十多期《文化

中國》，建立學術文化對話的平台，也進入貧困農村和城市民工中，了解民間疾苦，資助了五千五百多位貧寒學生，直供到大學畢業。此外也向中國政府提交過三十多個改革建議書，反映民間疾苦，及社會改進的建議，包括教育、醫療、文化寬容、宗教自由、民工處境、尊重人權、符合國情的民主體制等，政府都聆聽，部份建議也有實行。這都是我們反思「中華神學」時的反思背景。

中華神學的方向

中國基督新教發展到第三世紀，當是進行深入神學反思的年代，若要生根中國，必須以中國思維方法，及以中國處境來消化及架構聖經真理。這稱為中華神學。

何謂「中華神學」，在探討之時，應先區分出「基督信仰核心真理和價值」與「基督教文化傳統」。所謂「基督信仰核心真理和價值」，是指基督教聖經的基本信仰是上帝的啟示，其內容核心是宇宙有一位無限完美、公義慈愛而有性情位格的上帝，祂創造天、地、人，人用自由選擇了與上帝隔離，產生了罪的狀態，而形成人間的衝突和痛苦，上帝道成肉身成為耶穌基督，經歷人的悲歡離合，最後被釘死十字架，承受人類苦與罪，而後復活，帶給人救贖，並有永生的盼望，因祂的復活，使天國的博愛與美善在地上出現，但要待基督再來，才全面建造新天新地。這是信仰的核心理念，是基督教的普世性真理。至於「基督教文化傳統」並非普世真理，只是對普世真理的文化詮釋。

自教會建立以後，信仰傳到不同的文化，就會遇到不同文化的人間的問題，按文化獨特的思維和處境，來建立其神學，因而產生了「基督教的文化傳統」。在印度、中東、歐美均有基督教文化傳統。由於信仰最早傳入希臘羅馬文化中，為了回應希臘羅馬人所提的問題，產生了西方神學的反省，經過幾百年與西方文化的交融，終成功生

根於西方文化之中，成為歐美文化的泉源。目前基督教文化以歐美的傳統最為龐大及最有代表性。歐美基督教傳統當然十分偉大，但必須認清，這是基督教真理的西方文化詮釋，不等如是基督教核心的普世真理。

基督教最初傳入中國的時候，是一種西方神學所建構的基督教。西方神學是因應西方文化中的問題而開始，例如三位一體、基督論等都是為了回應希羅文化的問題而產生的，當代神學則依傳統課題去回應近代啟蒙運動的理性思想，及二十世紀以來如海德格爾、伽德默、哈貝瑪斯、德里達及理奧泰等對神學的挑戰。但當傳教者將一些西方文化的思想結論帶入中國的時候，往往會發覺這些問題並不是中國人感興趣的問題，也不是中國人所重視和反省的問題。對中國人來說，由於文化的背景，他們對基督教的看法會有不同的神學思考。當中國基督徒接受了基督信仰核心價值後，嘗試從中國文化的思維方法，按中國處境去作神學反思，用中國人的心靈去消化和架構聖經的真理，建立的神學結構，可稱之為「中華神學」。在這創建過程中，保持了福音核心內涵的，稱之為「中華福音神學」。

「中華神學」不同「本色化」（indigenization）思想，梁家麟提到本色化的討論主要圍繞如何使基督教信仰能在一個非基督教的文化中傳播、發展和生根，但往往割斷了基督教的傳統[注五]。這觀點有一定的洞見，表明了本色化有可能為了遷就文化，扭曲了信仰。梁家麟的看法觸及問題較為表層，讓各方研究相關課題的人士進一步循這方向思考和提問，例如他說的基督教「傳統」，是否等如基督教的核心真理和價值，抑或這「傳統」只是西方文化中的基督教神學，原是基督教在西方的本色化？若如前言，我們需先區分出「基督教核心真理和價值」與「基督教文化傳統」，則關鍵問題是「中國本色化」的後果，會不

中國基督新教發展到第三世紀，當是進行深入神學反思的年代，若要生根中國，必須以中國思維方法，及以中國處境來消化及架構聖經真理。這稱為中華神學。

中國不重抽象性的邏輯推論，卻重具體的、可通過修養去體驗的真理，也重整體性和關係性的思維。中國神學反省，必須能運用中國的思維方法和特有理念，去建造中國基督教的神學。

重，而未能表達中國文、史、哲、藝的深度反思，而其出版的著作很多是神學與西方當代最高的哲學對話，包括很多西方神學的翻譯，誠然貢獻很大，但那是用漢語去討論西方神學，卻不是立根於中國哲學與文化的神學反思。

「中華神學」也不同于今日華人教會部分人所推的「歸正神學」。「歸正神學」來自改革宗神學，亦即加爾文派神學，由於加爾文用非常清晰的邏輯系統表達神學，其後加爾文主義利用歐洲啟蒙運動的理性方式，將聖經語句放在命題真理的系統中，建立聖經真理。這種神學的優點是清楚地將聖經作理性化處理，真理系統簡明而高超，但卻結合並非來自聖經的啟蒙運動思想方法，把基督教變成一套抽象冷硬的命題系統，高高在上，失去了信仰作為一種敘述(narrative)的豐富生命內涵與情懷，而且是純近代西方的結構，因此排斥中國式思維，也與中國心靈格格不入，而容易被中國人視為傲慢自大。「中華神學」嚴格持守福音真理，但並不陷入啟蒙運動式的抽象真理中，卻強调用中國文化的思維和理念去構作聖經真理，並由此可進入中國人心靈深處而生根中國。

「中華神學」正視中國的思維方法，與西方大大不同。中國不重抽象性的邏輯推論，卻重具體的、可通過修養去體驗的真理，也重整體性和關係性的思維。中國神學反省，必須能運用中國的思維方法和特有理念，去建造中國基督教的神學。

「中華神學」反思中國人所提的焦點神學問題，與西方文化所提的很不同，須按中國的思維方式來回答。七十年代新儒學大師的掌門弟子蔡仁厚就曾提出儒家與基督教的八大焦點問題，就完全與西方神學不同。當年除了周聯華牧師回答外，本人就提出一個不同西方的，具中國特色的神學理念和結構去回答，後來編成《會通與轉化》一書，是基督教與唐君毅及牟宗三等新儒學的第一次對話[注七]。我在其中提出

會扭曲了「基督教核心真理和價值」。

更深層的問題，是用「本色化」一辭，已先假定一套西方的基督教傳統，為了向中國人傳福音，就要將西方基督教來「本色化」，這當然會扭曲或割斷西方傳統了，後果就變成不倫不類。恰當的做法，是先走出西方思維所架構的基督教文化，回到聖經原始的信仰核心價值，再以中國的思維方式來重構神學思想，那就是「中華神學」。

「中華神學」也不同于「處境化」(contextualization)思想，因為「處境化」有時譯為「語境化」，原是語言學家所用的辭，信仰處境化是以聖經是上帝的話語，是普遍的真理，但這話語如何能溝通傳遞給不同文化和語言處境中的人呢？Flemming定義處境化為：「福音進入一具體歷史文化處境中的活力而完整的過程，處境界定為各種不同的界限，如區域、種族、文化、語言、族裔、社會及經濟狀態、政治結構、教育、性別、年齡、宗教和神學的傳統，世界觀和價值(即受眾的『生活世界』)」[注六]。這觀點是從宣教意義上，為了傳福音之目的而作的思想，一般處境化反省，先假定有一套西方的正統基督教是普世真理，為了宣教而作出一些調整，去配合中國處境。中華神學則認為西方基督教傳統是文化的，不具普世性，聖經的核心真理才是普世的，當其進入中國，不單為了方便處境而反省，且須進一步以神學反思為主軸，尋求深入了解中國文化，包括哲學、宗教、文學和藝術，去體會、欣賞與掌握，也對基督信仰基於聖經而來的核心真理價值，有深度的委身、經歷與理解，再融會而後建立的，是為「中華神學」。這不祇是為了宣教或護教，卻是一深刻的神學建設。

「中華神學」也不同于「漢語神學」，雖然兩者都是因應中國大陸基督教的興起而作的努力，大家方向很接近，漢語神學中有些神學創作也是中華神學定義下的作品。主要分別在「漢語」一辭的語境性太

「道體論」(Taology或Daology)理念去探討上帝，「陷溺其心」理念去探討罪等，都是「中華神學」的嚐試。

「中華神學」正面面對儒、釋、道思想提出的問題，反思從中國思維來作神學的正面回答，絕不迴避，也不會簡化地將問題放入西方框架來處理。如儒家很重視道德良知，這種道德良知是否能夠令人得救呢？若不能夠，是什麼原因呢？儒家的聖人、道家的至人、真人，佛家的佛與菩薩，都屬「肉身成道」，這與「道成肉身」的基督有何異同？又中國文化主流以性善論為本，對於基督教中「罪」的觀念相當抗拒，特別是「原罪」的觀念。如何以中國文化的特色和概念來處理罪的問題，如何用中國哲學理念來解釋「罪性」呢？這些都是中華神學反省的重要焦點課題。

「中華神學」從聖經去反思和處理中國哲學的「終極真理」問題，例如中國上古經典所描述的「上帝」，「中華神學」拒絕未經研究就說兩者毫不相同，或未經概念區分就視之為等同，卻要深入探索、消化和辨別。此外中國哲學中的終極真理如太極、太和、天及道等等的理念，神學須依聖經去找尋一些溝通點，統合融會，而又不失去基本信仰立場，關鍵在確立具有性情位格的上帝，並在理論上安放「太極」和「天」的理念在神學架構中。

「中華神學」須反思佛家的「緣起性空」與道家的「無」與「無為」思想，尋索從基督教聖經及神學反省中，理解「空」與「無」的定位，在神學上打通「空」、「無」與「道」的智慧，去建立空的神學及道體論的神學，使「中華神學」得以貫通和超越佛道哲學。

以上這些方面均是「中華神學」要思考的問題。這是逃避不了的，若不通這些思想脈絡，基督教在中國雖然信徒不少，但仍難以生根於中國心靈中。

中國文化不單有高層哲理，也有深入的實踐修養工夫，去証悟真理，高知識階層

講修養境界，民間則有氣功與武功。基督教也有長遠的靈修傳統，「中華神學」須反思中國修養與信仰靈修之異同，並從神學上去詮釋境界與氣功的現象，而不簡化地視之為邪靈工作。

上面所論的是對中國哲學與文化的反省。另一個很嚴峻的問題是，基督教傳入中國的時候是西方對中國最迫害的時候，因此宣教士與西方文化扯上了關係，讓中國人認為宣教士與西方帝國主義是同一陣線的，從而引起了很嚴重的誤解。中國在近二百年救亡圖存，要找尋中華民族的命運，要重新建立自己，這種歷史的傾向在中國當代發展中很重要。基督教神學如何探討中國時代性需要的歷史問題呢？如何以基督教承擔中華民族命運的角度來發展基督教？基督教如何能與中國社會主義社會的現實相適應呢？亦是「中華神學」需要深入反思的。

今天我們需要以中國人的心靈來消化基督教，然後以中國人心靈所產生的問題來探討中國的神學思想。只有通過中國人的心靈去消化基督教，才能夠一方面讓基督信仰對中華民族的命運有所承擔，另一方面使基督信仰與中國文化的概念交匯與融合，使基督教能夠在中國生根。

深入探討建構中華神學的可能方向，須走出西方希臘、羅馬、現代與後現代的觀念框架，研究中國的思想維模式，包括關係理念、整體網絡理念、感通理念、具體真理觀的理念、修養與靈魂上溯的功夫、古中國上帝觀與上帝啟示的上帝觀，及中華神學的方法論等。從新理念去整理神學思維，並研究如何建立一個中國基督教的宇宙觀，去回應民間宗教的種種現象。建立了中國的基督教思想後，可以尋到新的中西結合思想方式，以中國哲學去克服後現代西方的「自我中心主義」與「虛無主義」，以中華神學滋潤西方神學與哲學，最後克服全球性的精神空虛與迷惘問題，帶來全球文明的更新，這是「中華神學」的最

以中國哲學去克服後現代西方的「自我中心主義」與「虛無主義」，以中華神學滋潤西方神學與哲學，最後克服全球性的精神空虛與迷惘問題，帶來全球文明的更新，這是「中華神學」的最高理想。

行，生息萬化。大道即空即有，是宇宙之智慧。此為道的境界。唯有以虛靜靈明之心，除去成心與執著，可體會天地之大道流行，生息萬化。大道即空即有，是宇宙之智慧。此為道的境界。

高理想。

中國境界的領悟與境界神學

我十三歲讀老莊，十五歲研佛書，開始靜修，在信基督前經歷六重境界，可歸結為三重領悟：

1.十七歲時，經靈界多次難擾，堅持心靜如水，突然領悟，天地因緣起滅，萬法性空，通體透明。大學時隨霍韜晦學佛法，二十一歲研講華嚴，全身震動，悟萬法相攝相入，事事無礙，一微塵可觀三千大千世界，並且心生無盡大悲。此為佛的境界。

2.十八歲時觀一花一木，鳥獸魚蟲，悟天地萬物，各有其所由之道，此道先地生，寂兮寥兮，為天下母。唯有以虛靜靈明之心，除去成心與執著，可體會天地之大道流行，生息萬化。大道即空即有，是宇宙之智慧。此為道的境界。

3.十九歲讀梁漱溟，二十歲追隨唐君毅與牟宗三，反省內心，發現對人間苦難有一不止息的惻隱與悲憫，這是人的仁心，原是天命之性，乃宇宙本體，充天塞地的靈明。二十一歲大悲湧流，生生不息，在寒冬為植物枯死而悲哀，但忽見枯樹在寒風中，露出新芽，忽悟上天有無限創造性，與我心靈仁德的湧流，是同一的本體，天人原來自一仁善之本體，天人本合一。此為儒的境界。

因天是仁愛悲憫之體，故天應有情，讀詩經書經，知古人信上帝，為終極的宇宙親情。遂學孔子向天禱告，尋求與這終極的悲愛根源感通，即遇上帝派來的基督徒，遂研習聖經，得知上帝曾對人間有直接啟示，且道成肉身成為耶穌基督，在人間經歷悲歡離合，以十字架上極大的痛苦，來擔當眾生的苦難，寬恕人類的罪過，然後死而復活，將苦罪轉化為仁愛新生命。任何人回復單純真誠的心，即可從信心開放，直接與上帝無限之恩情大愛感通，而得大喜樂。這是一特別的救恩，上帝的恩情，只有通過基督才能體會。

本人明白基督教之核心，是宇宙親情對人的啟示，不同儒道佛之為哲理和內修的宗教。研究歷史材料與証據，知耶穌復活是當年多人目擊事實，並非百年後口傳的神話。遂以純全之信心開放靈性，接受基督，即時榮光照臨，聖靈能力從神聖世界流入，身心光明，即悟基督確是上帝，乃得大樂。

以後心如晶瑩水晶，閃耀靈光，並再經八重境界，包括愛仇敵，即體証而知所信是真實。緣起性空是上帝從無去創造天地之本，大道無形是上帝創造之規則，仁心流現是上帝賦與的靈性。儒、道、佛均為聖人對上帝創造秩序的真實體悟，不涉及救贖，故不同於上帝的直接啟示與人得救之道，義理上屬不同層次與範圍，只要在神學上區分創造(Creation)與救贖(Redemption)之不同義理結構，則信仰與中國文化處在不同義理的意義結構中，並無衝突。人若深探各教之境界，可發現是通向認識上帝的階梯。故在博士時深研孔孟與易學，之後三十年以深研佛道儒與基督為主，發表了七十多篇論文，數千短文，尋求基督教中國化之道。

其中努力統合不同思想和學派，初步反省在二十七歲以故事形式寫《慧境神遊》及三十多歲時寫《會通與轉化》等著作中見，四十多歲開始作體系性建構，綜合成五十一歲出版的《中國哲學的重構》一書，從生活世界及心靈之覺性為本，分析心靈如何構作對世界的認知，及如何領悟事件的真實本體，再描述心靈不同層次的領悟，建立一個境界哲學的系統，從不同境界去詮釋人對真、善、美及佛、道、儒的體悟，並以這境界的層次去展示上帝的境界及啟示的可能性，使人的存在成為開放向上帝的聆聽者。這境界思想體系是中國佛道儒哲學與神學接通的關鍵理論，這亦是中華神學根於中國文化的一個始點，可稱為「境界哲學與神學」。

恩情神學與感通、神遊與參讚 天地等神學

境界哲學和神學是由人的反省和領悟，作「上迴向」的思路而達至肯定上帝，但基督的核心是上帝的主動啟示，是上帝與人立約，以恩典下臨人間，建立神人的親情關係，這是「下迴向」之思路，我由之而建構「恩情神學」，是中華神學反省的第二步。

之後我寫了十多篇中華神學的論文，探求與易經、道德經和莊子的融合，其中亦包括回應西方後現代哲學，及分析馬丁蒲伯、列維納斯和海德格爾與中華神學的關係。提到「三極感通神學」（又稱「彩虹神學」）、「參贊天地神學」及「造物與人遊的神學（簡稱神遊神學）」等等神學反省模式。

其他相關的論文有五十多篇，討論德里達、哈貝馬斯、里奧泰、伽德默、福柯等思想大師與中國哲學如孔子、孟子、朱熹、王陽明、老子與莊子等的比較融會，並從易經推出「感通的本體詮釋學」及天、地、人的「他者共在」和諧思想模式。這一切研究，是嚐試從儒道哲學去建立一個後後現代的網絡宇宙觀，配合當代科學上的宇宙起源論及量子力學，構作融會中西哲學與文化的「關係感通本體論」，解除後現代之虛無主義。最後由這「關係感通本體論」，去建立中華神學，由關係與感通理念解釋三位一體、道成肉身、罪與苦的形成、救贖的復和、上帝國度的實現及未來新天新地之來臨。其中也包括對歷史責任的承擔、研究仁愛、公義、民主及和諧的制度與實踐，研究理想空間和正義城市的、研究身體得實現完美的文化與社會條件，由這「關係感通本體論」使神學、哲學、宗教學、社會學與城市學的研究得到融會統合。

中華神學的課題

後後現代的「中華神學」將是中國基督教未來的神學思考，經三十多年的反思，

我想「中華神學」討論重點包括以下各大課題：

一、方法論與新理念

關係（relation）與實體（substance）或存在（being）

- 如何從關係理念探討上帝、三位一體、神人關係等；
- 感通、I-Thou relationship、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等理念的反省，如不忍之心；
- Community的神學意義。

整體（holistic）與網絡（network）思維與個體（individualistic）與主客對立（subject/object/separated）思維

- 整體性的神學宇宙觀與理性宇宙觀之別；
- 中國神學宇宙觀如何回應太極、陰陽、五行，及民間道佛教諸神的宇宙觀；
- 一體多元的本體論，天地人的神學本體論。

二、修養與成聖實踐的思想

具體真理（concrete truth）vs.抽象真理（abstract truth）

- 生活世界（Lebenswelt）的神學反省；
- 修養成聖與道成肉身的分別；

感通倫理

- 關係倫理與責任倫理；
- 中國基督教倫理觀，感通與隔絕作為善惡標準。

從神學回應牟宗三「圓善論」

從神學回應成中英的本體詮釋學

三、既濟未濟的天國思維

易卦精神與天國的既濟未濟（already but not yet）；

文化神學、中國文化的神學，及中國神學對文化的承擔；

歷史神學及中國神學對民族與歷史命運的承擔。

四、中國哲學的神學反省

境界哲學和神學是由人的反省和領悟，作「上迴向」的思路而達至肯定上帝，但基督的核心是上帝的主動啟示，是上帝與人立約，以恩典下臨人間，建立神人的親情關係，這是「下迴向」之思路。

許多中華神學工作者有不同的研究和提議，綜合多人各自的努力，若成功建立生根於中國的「中華神學」，那將是人類文明的一大成就，也是基督教成功融合西方文化後，最重大的發展。

儒家的天與上帝及其神學反省；

易經太極與天、地、人三才的神學反省；

道家的道、無與無為及其神學反省；

佛家的空、禪、一心三觀及其神學反省；佛家的自性清淨心，事事無礙境界及大日如來法身佛（或毗盧遮那佛）及其神學反省。

五、信仰境界與儒釋道境界

從神學定位空、道、天及上帝的概念與實踐功夫；

靈修中證悟的上帝境界與空、道、天的修養境界之不同描述；

從中國靈修神學回應打坐修養。

六、後現代與後後現代的神學反省

以中國思維回應後現代文化，以神學回應中國思維；

從聖經的天、地、人思想建立生態神學。

以上只是我認為基督教與中國民族文化交匯的焦點課題，當然還有許多中華神學工作者，有不同的研究和提議，綜合多人各自的努力，若成功建立生根於中國的「中華神學」，那將是人類文明的一大成就，也是基督教成功融合西方文化後，最重大的發展。

（本文作者並為上海師範大學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另可參考梁燕城《文化創傷與百年苦難的理則——探索一個新的詮釋歷史和社會模式》載《文化中國》（溫哥華：文化更新出版，二〇〇八年九月）第五十五期。

[注四]參考梁燕城《基督信仰處境化三模式與當前中國——利瑪竇、李提摩太與戴德生比較，李金強、吳梓明、邢福增編》載《自西徂東——基督教來華二百年論集》，（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二〇〇九年）。

[注五]梁家麟：《徘徊於耶儒之間》（台北：宇宙光，一九九七年），頁四二至四三。

[注六]2 Flemming, *Contextualization in the New Testament*, 20.

[注七]蔡仁厚、周聯華、梁燕城，《會通與轉化》（台北：宇宙光，一九八四年）。

Title: Chinese Theology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On The Christian Theological Reflection Direction

Dr. In-sing Leung(Chief Editor of Cultural China)

Abstract: There have been 1300 years since Christianity spread in China. At present, the value of Chinese Culture has been completely regenerated, however, the whole society produced many new problems. In this new situation, Chinese Christianity must seek a new position in the Chinese Culture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article especially discussed "Chinese Theology" in the current direction, it pointed out that today's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Christianity is the age of in-depth theological reflection, if it would like to take root in China, it must have the Chinese way of thinking, and it is to digest in the Chinese situation and structure the Truth of the Bible. Successfully taken root in China, "Chinese theology" not only will be a big achieve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and but also it will be the most significant development after Christianity successful integrating with the Western Culture.

Keywords: Christianity; Chinese Theology; Theological Reflection.

[注一]這方面的綜合研究，可參考邢福增《文化適應與中國基督徒，一八六〇至一九一一年》（香港：建道神學院，一九九五年）。

[注二]這段歷史的綜合研究，可參考林榮洪《中華神學五十年，一九〇〇至一九四九年》（香港：中國神學院，一九九八年）。

[注三]耶魯大學社會學大師謝腓理（Jeffrey C. Alexander）提出文化解釋的一個新理論模式，名為「文化創傷」（Cultural Trauma）。用這觀點去探索群體的歷史災難，如何影響了民族文化的集體意識。參考Jeffrey C. Alexander, Ron Eyerman, Bernard Giesen, and Neil J. Smelser, *Cultur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Berkeley: